



我当大队通讯报道员

■ 文/吴春波

我从小就渴望当一名新闻工作者，但由于家庭出身的原由，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回家务农，慢慢也就断了这方面的念头。

1977年，我接受了“贫下中农”的三年“再教育”后，在表姨（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）的关心帮助下，步入了农村通讯报道员的行列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一干就是5年。

说起通讯报道员，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脸茫然。但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及从农村走出来的人，一定不会陌生。那时报纸、广播主要靠各地通讯报道组投递的稿件组版、播诵，不像现在有专门的新闻工作者和网络渠道。县广播站的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各播报一次，早晚主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，也播报本地新闻，还放送一些音乐及“样板戏”的实况录音等娱乐节目。

我担任大队通讯报道员后，每天除了在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晚上还要学习时事政治，不时地给公社、县广播站写稿。俗话说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”，慢慢地我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给省报投稿。这跟给公社、县广

播站写稿可不一样，它对稿件质量要求高，见报率还特别低。那时每个生产队都订有一份《新华日报》，我经常到队长瑞根叔家借来阅读，还以闲聊的形式找人“采访”、做笔记，晚上挑灯构思撰写，经常熬到深夜。由于基础差，写稿不要领，几乎隔三五就收到退稿信，好几个与我一道长大的同伴编了一句顺口溜讥讽我：“吴记者，水平高，专为报社写参考！”

我不为所动，坚持努力。半年后，稿件《三只化肥袋》终于见报了！这是我投的第一百六十篇稿件，我激动得如同买奖券中了头彩。瞬间，感觉浑身发热，一颗心突突地跳个不停，特别快乐与兴奋。找到报纸拿出底稿一对照，我发现编辑修改处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随后第二篇、第三篇陆续被刊登出来……

我底子薄，只上了初中，因此，为了完成报道任务，必须刻苦学习文化知识。我每天晚上在灯下读书自学、练习，直至午夜凌晨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想找点学习写作的材料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一次偶然去亲戚正扬家串门，发现了

一本《怎样写新闻报道》，我如获至宝，赶紧借了过来。那里面讲了怎样写消息，通讯如何写，新闻的五要素等等。我读后茅塞顿开，如雾散天晴，心里豁然开朗。拿它当尺子，衡量报纸上的文章，丝毫不差。有人说“文无定法”，其实不然。无论啥事，只要留心，那里面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。

作为一名农村通讯报道员，我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，我在农村“采访”时，常常背着许多报刊。充分利用空闲时间，和社员们共同学习探讨。识字的，我就拿给他们看，不识字的，我就读给他们听，千方百计地让社员们知法、懂法和守法，千方百计地让社员们既了解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又增加社员们的科学文化素养。

我常常把读书、看报、听广播所获得的信息、经验和体会告诉群众，帮助他们解放思想，转变观念。我在“采访”报道中，常常呼吁青少年要多读书、勤看报。

我在报刊、电台和广播站发表（播诵）了许多文章，其中，有的文章观点让群众深受启发和

鼓舞，尤其是学习安徽小岗村农民大包干的心得体会，深受当地群众的推崇。

我虽然只是一名初中生，但是通过长期的读书、看报、听广播，增加了科学文化知识，增长了智慧，开拓了视野，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

后来，我进入工商部门工作，并被推荐到苏州大学“委培”进修，虽然这里有老领导关心的因素，但也得益于我会“写文章”这一特长。新的空间，新的平台，新的生活，与我曾经的岁月不可同日而语。基层调研、机关业务、上级会议，新闻无处不在。即便，我已不是通讯报道员，却因为写过几篇新闻稿，有些心得，便也多了一些常人没有的灵感。于是，时不时撰写一些新闻和文学稿件，并按照行业、内容的不同，分别投给不同的媒体单位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如歌。一晃近50年时间过去了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时代的变迁，上世纪的公社和县广播站早已销声匿迹，而我在担任大队通讯报道员的过程中，所学到的知识和受到的“滋养”却至今仍在受用。

作者自述 吴春波

镇江东乡姚桥解放桥村人，高级经济师，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出版《沙腰河畔》《江河交响》《行者人生》等著作，现任镇江市儒商协会秘书长。

走村串户写对联

■ 文/孙建远

当年，在我的家乡过年贴对联可是件大事。种田人虽然不知道“万象更新”这个词，但知道旧账翻过，新账就要开始了。

我们那儿还有个很有人情味的习俗，欠债务的人家只要门上贴了对联，债权人就是再狠也不能砸人家的门要债了，怎么也不能不让人家过个安稳年啊！所以，有些过得差的人家，他这么搪，那么塞；这儿躲，那儿藏，好不容易挨到“三十晚上”，一大早就急急地把对联给贴上了。

这些都算是对联的妙用。过去，很多乡下人不识字，不会写对联，那不要紧，有专门写对联的人。在我家乡一带上门写对联的人，和我同姓，但不同宗，不好按辈分称呼。他没上过多少学，也没跟哪个名师学过，就是一个在家种田的，可他就是大字写得好，方圆十里之内，很多人都找他写。

人们说他对联写得好，一是他写得快，很多笔画很复杂的字他一笔就下来了，二是他写的字黑。一个种田的人能写出这么一手好字，当然引以为傲了。一些人因此下结论：写字出手好坏都是天分！

进了腊月门写对联的人就忙起来了，他的主顾大都是固定的，由远及近一个村一个村地安排日

程。我们村离他家近都是安排在“送灶”后的两天，这时家家都在忙年了，家庭主妇们都在河塘边洗“咸货”，他的到来更增添了过年气氛。

他一早扛着个老蓝布包袱捆着整刀整刀的红纸，拎着装在箩筐里的笔墨砚来了。在生产队的晒场上，我们几个放了寒假的学生迫不及待地去围观，顺便给他当服务员：抬桌子、磨墨、牵纸、裁纸、晾写好的对联，依次到户家去喊人……磨墨是最重要的，上门来写对联的师傅就要墨浓，磨墨的孩子摁着个老砚台磨了半天，他用毛笔蘸点墨一试，还叫再用劲磨，这可是力气活我干不了，我都是牵纸。

一般人写对联都要把裁好的纸叠一下，五个字的折五格，七个字的折七格，这个做法，本家师傅完全不用，他抓起来就写，他写的字很少规规矩矩在格子中的，但贴起来很好看，他高兴起来就欣赏晾在地上他写的那些横七竖八的字，还给我们讲郑板桥写的字叫“乱石铺街”。当时我们不懂，现在想起来当年他可能是学过不少碑帖，不然他怎么知道郑板桥的书体呢！

我帮他牵纸，他写的那些对联我早就烂熟于心了。大门都是

“向阳门第、积善人家”，或“向阳门第春长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”，再就是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，或“物华天宝日，人杰地灵时”，或者“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”，两联没有见他加什么东西。他脑子里也就这么七八副大门对子，但对同一巷子里、左右隔壁人家大门上的对联，一般不会重。

我们村上原来有两家开米酒坊的，这酒坊的对联他就只有一副“隔壁三家醉，开缸十里香”，只好把两家的都写成一样的。后来，我告诉他后边坊里看到一副“杜康开缸三家醉，刘伶知味且停车”，当时他和我都不知杜康、刘伶何许人也，但都确信他们和酒有关，他总算有了两副酒坊对联，当年他恐怕要比我大三十岁，可还是很感激我。

他写对联是以纸收费，事先就帮主家精打细算好：几张纸，几副大门的，几副房门的，几副单扇门的，几副双扇门的，再一一将纸裁好。

那时，村上有很多人家里没有识字的，到过年那天贴对联时就麻烦了。看形状大小能认出大门的来，单扇的房门对联都是狭长的就难辨了。有人就把该贴在儿媳妇房门上的“喜见红梅多结子”之类的贴在老婆婆房门上

了。把上下联贴反更是常事，不少人家常把灶老爷门上的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贴反了。这时，如何贴对联，就要请认字的来指点了，那首选人物就是我们这几个跟在写对联的人鞍前马后服务的学生了。

给写对联的人牵纸，教村上人贴对联，很自然地培养了我对“对文”的兴趣。新年跟大人去亲戚家拜年时，每过一村，路边人家新贴的对联我都要读一遍，没见过的就默记在心里，没多久，我就无师自通地将陌生对文的上下联分清了。有次春节随父亲去了一亲戚家，我就指出他家房门上的对联贴反了，那对文是“梁家夫妇齐眉案，郭氏儿孙笏满床”。虽然我当时并不全理解其中的用典，甚至连“笏”字也不识。

对文看多了就觉得大都是老一套，超过本家师傅肚里那点货的并不多。但偶尔在一村头上看见一副很一般的对联“田园自有乐，鱼鸟亦相亲”。虽然当时对这副对联理解还不深，便觉得它别有情趣。有次在一家看到厨房的对联是“入厨先净手，上灶莫多言”，就比那些“五味调和百味香”亲切多了。看来，我对文字的兴趣，最早恐怕就是给写对联的本家师傅牵纸时引起的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陈融

校对 陈乐

作者自述 孙建远

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，有作品在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镇江日报》《京江晚报》《现代金融》等媒体及公众号发表，现供职于农行镇江新区支行。